

普通高等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规划教材

《说文》学导论

■ 万献初 著



WUHAN UNIVERSITY PRESS

武汉大学出版社



■ ■ ■ 普通高等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规划教材 ■



《说文》学导论

■ 万献初 著



WUHAN UNIVERSITY PRESS

武汉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说文》学导论/万献初著. —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4. 3
普通高等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规划教材
ISBN 978-7-307-12831-6

I. 说… II. 万… III. 《说文》—高等学校—教材 IV. H16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032996 号



责任编辑:程牧原

责任校对:鄢春梅

版式设计:马 佳

出版发行: 武汉大学出版社 (430072 武昌 珞珈山)

(电子邮件: cbs22@whu.edu.cn 网址: www.wdp.com.c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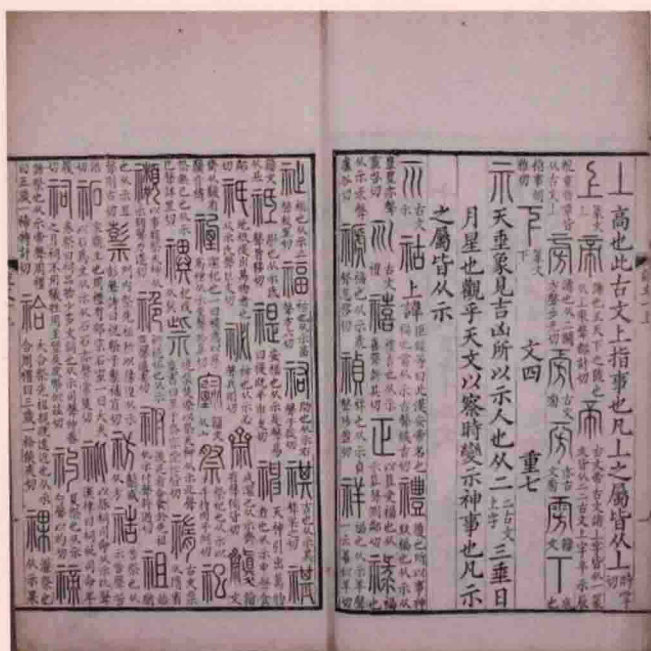
印刷: 湖北省荆州市今印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720 × 1000 1/16 印张: 18 字数: 323 千字 插页: 4

版次: 2014 年 3 月第 1 版 2014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7-12831-6 定价: 32.00 元

版权所有, 不得翻印; 凡购我社的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当地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藤花樹本《说文解字》（汪中所藏宋小字本，丁晏道光十八年跋）

示天垂象見吉凶所以示人也从二𠂔古文三垂日月星也觀乎天文以察時變示神事也凡示之屬皆从示

示天垂象見吉凶所以示人也从二𠂔古文三垂日月星也觀乎天文以察時變示神事也凡示之屬皆从示

王昶藏宋小字本《说文解字》（四部丛刊影印日静嘉堂存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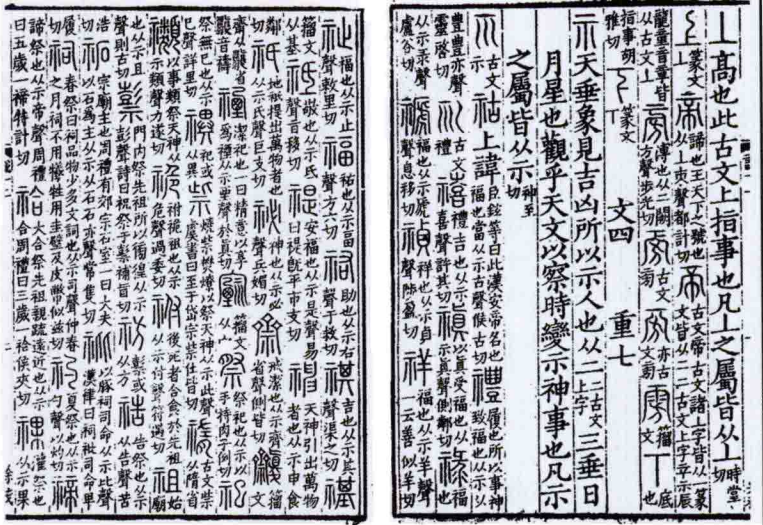
說文解字通釋卷第一
示 示，天垂象，見吉凶，所以示人也。从二𠂔，古文三垂，日月星也。觀乎天文，以察時變，示神事也。凡示之屬皆从示。

說文解字通釋卷第一
示 示，天垂象，見吉凶，所以示人也。从二𠂔，古文三垂，日月星也。觀乎天文，以察時變，示神事也。凡示之屬皆从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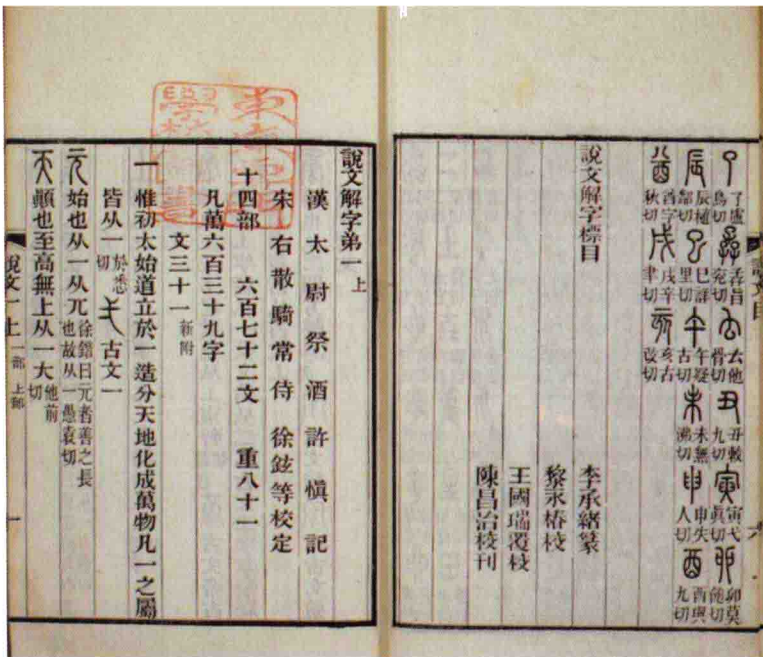
示 示，天垂象，見吉凶，所以示人也。从二𠂔，古文三垂，日月星也。觀乎天文，以察時變，示神事也。凡示之屬皆从示。

示 示，天垂象，見吉凶，所以示人也。从二𠂔，古文三垂，日月星也。觀乎天文，以察時變，示神事也。凡示之屬皆从示。

褚刻《说文解字系传》（中华书局影印道光十九年刻本）



孙星衍平津馆本《说文解字》（嘉庆九年刻本）



陈昌治刻《说文解字》一篆一行本（同治十二年刻本）

• 绪 论	(1)
• 第一章 《说文》的编排体例与说解条例	(15)
第一节 《说文》的构架与部首、字序的排列	(16)
第二节 《说文》的说解条例	(21)
第三节 《说文》的辨析性条例	(39)
• 第二章 《说文》五百四十部首讲解	(47)
• 第三章 “六书”——《说文》小篆的构形分析	(89)
第一节 “六书”名称的由来及其内容	(89)
第二节 “六书”的定义及其应用	(91)
第三节 “六书”的局限性及其在汉字发展史上的作用	(103)
• 第四章 《说文》白文的读法	(106)
第一节 解读《说文》白文的原则与方法	(107)
第二节 《说文》白文训释类型及其条例的正确解读	(112)
第三节 《说文》“𠩺、𠩺”两部字白文分类解读示例	(117)
• 第五章 段玉裁《说文解字注》的贡献及其读法	(130)
第一节 《六书音韵表》的构成与作用	(132)



第二节	《说文解字注》的注释术语与条例	(138)
第三节	《说文解字注》的价值与贡献	(152)
• 第六章	《说文解字诂林》与古代《说文》研究	(163)
第一节	《诂林》的总体框架与引用书目	(164)
第二节	《诂林》实引著作分类简介	(166)
第三节	《诂林》“天”字汇解示例	(190)
第四节	《诂林》的价值、不足与未收书补目	(196)
• 第七章	现当代《说文》研究综论	(200)
第一节	现当代《说文》研究进程及其文献简述	(200)
第二节	现当代《说文》研究资料的甄选与汇聚	(226)
第三节	现当代《说文》研究论著总目录	(232)
	附录 台湾《说文》研究论文目录	(270)
• 后 记		(285)

绪 论

中国学术史上，有四部经典著作形成专门的学科门类：东汉许慎《说文解字》（简称《说文》），形成“《说文》学”，也称“许学”；南朝梁昭明太子萧统《文选》，形成“选学”；南朝梁刘勰《文心雕龙》，形成“龙学”；清曹雪芹《红楼梦》，形成“红学”。以“《说文》学”形成最早，影响最为深远。

“《说文》学”（许学），是以许慎《说文解字》为研究对象的专门学问，实际上就是“传统汉字学”。许慎撰《说文》，利用汉字形义统一的原理，全面整理汉字，归纳汉字构形系统，形成我国第一部按部首编排的字源字典，是传统汉字学的奠基著作。《说文》产生之时，就引起广泛重视，之后历代研究者很多，至唐代后逐渐形成专门学问——《说文》学。

许慎撰《说文》，博采通人，信而有征，叙录篆文，合采古籀，辨别异体，疏通形义，汇集整理通行文字，成为当时汉字规范体系的完备字书。其主要贡献有：以篆文为中心展示古文字字形的历史发展，清理并规范其时汉字的字用系统，创立部首据形系联的编排体例，完善“六书”理论并用以分析字形结构，说解汉字的构形本义使之达到形义统一。

从学术地位来看，《说文》总结并梳理了先秦、两汉的汉字学成果，系统保存并说解汉字的形、音、义，是研究各类出土古文字及传统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不可或缺的要籍，也是方言学、古文献学以及文史哲各学科重要的参考书籍，对中国学术发展的影响是深广而久远的。故黄侃先生在《文字声韵训诂笔记》（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3，第 71 页）中谓“《说文》者，一切字书之根柢，亦即一切字书之权度也”；又“《说文》一书，于小学实主中之主也”。王鸣盛在《说文解字正义·序》中说：“《说文》为天下第一种书，读遍天下书，不读《说文》，犹不读也。”



从汉语言文字学自身的角度看,《说文》是中国语言学史上第一部系统分析字形、说解字义、辨识字音的汉字字典。陆宗达先生在《说文解字通论》(北京出版社 1981,第 6 页)中认为《说文》“创立了汉民族风格的语言学。汉民族语言学的—个主要学科是‘文献语言学’,它研究的对象是周秦的书面语言,研究的内容是文字、声音、训诂,所以又称为‘文字声音训诂之学’。《说文》就是文献语言学的奠基之作”。

可见,《说文》及其研究形成一个专门学科——“《说文》学”是理所当然的,《说文》学的学科形态、内容、成就与影响是值得系统地了解和探讨的。

一、许慎及其《说文》成书的旨趣

许慎(约 58—约 147),东汉著名的经学家、文字学家,是我国传统汉字学的开山祖师,因而被尊为“字圣”。

许慎字叔重,汝南郡召陵(今河南郾城)人。初在汝南郡任功曹,后举孝廉,至洛阳,任太尉阁祭酒、涑长等职,人称“许祭酒”“许涑长”。许慎曾师从古文经学家贾逵(30—101)习古文经,又于安帝永初四年(110)与马融、刘珍等在皇家图书馆“东观”校五经、诸子和史传,因而精通经学、小学,有“五经无双许叔重”之称。其著述除《说文》外,还撰有《五经异义》《孝经孔氏古文说》《淮南子注》等,均散佚。清人陈寿祺撰《五经异义疏证》为许慎《五经异义》作辑注,较为详备。

许慎历时二十一年著成《说文》,极为用心用力,是他毕生最为重要的事业。他的《说文解字·叙》在永元十二年(100)就已写定,直至建光元年(121)病居家中,才命儿子许冲上表将所著《说文解字》十五卷、《孝经古文说》一篇进献给安帝,可见其看重的程度。关于撰著《说文》的背景、动因、目的、作用等,他在《说文解字·叙》中都有论述。

文字是用来记录语言的,汉民族的历史是由汉字系统记录下来的,汉族各时期的政治制度、社会内容和文化生活,主要靠汉字系统记录并传播下来。许慎很重视汉字的社会作用,其《叙》称:“盖文字者,经艺之本,王政之始,前人所以垂后,后人所以识古。故曰:本立而道生,知天下之至赜而不可乱也。”他著《说文》时,正是古文经通行的时代,今文学者极力非毁古文,谓秦时隶书是古帝先王之书,不得改易。他们据今文随意解说字形,牵强附会,漫无理据。许慎对此类俗儒鄙夫翫其所习、诡更正文、向壁虚造的用字混乱行为深恶痛绝,故努力搜罗篆文、古文、籀文编撰成字书,梳理文字传承历史,保存经传群书的故训,说解字形的构造理据、音读和所载词义,编排成书以便使用。即《叙》谓“今叙篆文,合以古籀,博采通人,至于



小大，信而有证。稽诂其说，将以理群类，解谬误，晓学者，达神旨”。

许慎对《说文》收字的系统编排是很费心思的，因而极富于创建性。他之前也有识字读本类的字书，但只是教童蒙识字的“杂字”类通俗字书。《叙》谓“及宣王太史籀，著大篆十五篇，与古文或异。……秦始皇帝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同之，罢其不与秦文合者，斯作《苍颉篇》，中车府令赵高作《爰历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学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颇省改，所谓小篆者也”。

《史籀篇》，《说文》引作《史篇》，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有文献可考的字书。周宣王太史籀著，原书15篇，为四言韵语式学童识字之书。原书已佚，今存《说文》所引《史篇》及所录“籀文”共223字，其字体同于石鼓文及春秋时代的秦系金文，称“籀文”或“大篆”。《仓颉篇》，也作《苍颉篇》，秦李斯所著字书，以“仓颉”二字开篇，因而得名。《汉书·艺文志》载《仓颉篇》6章，书早亡佚，清马国翰等有辑本，近年出土有《仓颉篇》残简。从佚文和残简看，《苍颉篇》是类似后来《千字文》之类的识字课本，四字成句，两句一韵。如“苍颉作书，以教后嗣。幼子承诏，谨慎受戒”等。《爰历篇》，秦赵高著，是用来规范小篆形体而编成的识字书，早佚，《汉书·艺文志》载原书有6章。《博学篇》，秦胡毋敬著，也是用来规范小篆形体编成的识字书，早佚，《汉书·艺文志》载原书有7章。汉代把《仓颉篇》《爰历篇》《博学篇》三书合为一书，也称《仓颉篇》。全书分55章，每章60字，共收秦代小篆3300字，为许慎撰《说文》收录小篆字形的主要来源。之后，扬雄又续《仓颉篇》而作《训纂篇》，东汉郎中贾鲂又作《滂喜篇》。后人再合《仓颉篇》《训纂篇》《滂喜篇》三者为“三仓”，都是四字成句构成韵语的识字读本。此外，西汉司马相如曾作《凡将篇》，为七字韵语。东汉元帝时史游作《急就篇》，七言、三言、四言交杂，魏晋南北朝时很流行，至今仅能看到《急就篇》全书，有唐颜师古注传世，其他“杂字”书都亡佚了。

许慎著《说文》，依据这些字书收录小篆等古文字形，但不再用它们“杂字”型的编排体例。这些“杂字”书的编排，只是组数字成句，编成韵语，便于记诵，没有字的形义解释和结构分析，没有字系的内在联系，没有理据性的系统编排。许慎撰《说文》的突出贡献，在于他创通汉字构造的条例，通过汉字构形理据的分析，创造性地编出第一部具有内在系统性的字书，为后世字书编纂创立了范式。

许慎《说文解字后叙》（十五卷下）交代《说文》编撰体例，谓“立一为耑，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同牵条属，共理相贯，杂而不越，据形系联。引而申之，以究万原，毕终于亥，知化穷冥”，是对其编撰宗旨的简明总结。《后



叙》还介绍《说文》成书的篇数、部目数、正篆、重文及说解的字数等，谓“此十四篇五百四十部，九千三百五十三文，重一千一百六十三，解说凡十三万三千四百四十一字”。然《说文》成书后屡经传抄，各项数据已不与初本相合了。检今传大徐本《说文》，收正篆 9431 字，重文 1279 文，说解字数为 122699 字。说明在历代流传中，后人改易之处的确不少。《说文》所收的小篆字系是按义类进行规整过的，许慎把 9353 个小篆字按义符归入 540 部中，即段玉裁注中所说“凡每部中字之先后，以义之相引为次。《颜氏家训》所谓隐括有条例也”。同义符的字类聚在一起，部内又按意义的关联来排次序，这样就便于比较和分析，也便于整体的贯通。

《说文》书末附有许慎之子许冲《上〈说文解字〉表》，称述其父作《说文》之由，谓“自周礼汉律皆当学六书，贯通其意，恐巧说衰辞使学者疑，慎博问通人，考之于逵，作《说文解字》，六艺群书之诂皆训其意，而天地鬼神、山川草木、鸟兽虫鱼、杂物奇怪、王制礼仪、世间人事莫不毕载，凡十五卷十三万三千四百四十一字”，简要地说明了《说文》一书的成就与特色。

许慎书名《说文解字》，“文”指独体的象形表意字（或构字部件），“字”指合体的会意字和形声字，独体“文”只能“说”其构形意图，合体“字”则可“解”其构成部分之关系，是为“说文”与“解字”。他完善“六书”理论并用以分析所收篆文的形体构造，根据形符的类别将这些看似杂乱的字形归为有序的 540 部，每一部立一“部首”统领该部之字，540 部首“始一终亥”据形系联地排列为有序的系统，每部内各字再据义分类排列。全书结构有序而系统，正如《叙》所谓“分别部居，不相杂厕。万物咸覩，靡不兼载”。每字的形体，以篆文为主，再列古文、籀文、或体，一一加以说明。每字的说解，先简说字义（主要是造字本义），次说形体构造（六书），特别重视字的形义统一；有的指出读音（读若），有时引用经传文句以为证，有的引前人小学书及故训之说解，还标姓名引用他人说解 110 余条，即“博采通人”之说。可见许慎撰《说文》以古文经字形为主，同时囊括此前各方面的经说和字说，的确是集两汉字学之大成。《说文》分类纂集并解析了 9353 个汉字的小篆构形，这种揭示汉字最初据义构形的造字意图的分析可称为“笔意”分析，即构成字形的笔画都有表意作用，《说文》这个基于“笔意”的小篆字系是一个成熟的带有理想化成分的汉字系统。

语言、文字是人类生产劳动和社会生活的产物，也是促进社会快速发展的重要力量，可借以反观古代社会生产、生活的形态。语言文字不只是传承、记录历史与文化的工具，还是民族文明高度发达的直接见证。汉字，是汉民族语言的书面载体，也是华夏数千年历史、社会生活、文化样态的书面



载体。汉字系统本身也是中华历史、社会和文化的结晶，蕴含了古远深邃而丰富多样的历史文化信息。章太炎先生 1902 年在《致吴君遂书》（《章太炎书信集》，河北人民出版社 2003，第 64 页）中认为汉字本身就是历史：“上世草昧，中古帝王之行事，存于传记者已寡，惟文字、语言间留其痕迹，此与地中僵石为无形之二种大史。”是说汉字构形本身就是史料，字形所含造字本义直接反映了上古历史文化的基本内容。《说文》是一部辑录、分析早期汉字及其构形系统的传世文献，其中蕴涵着先民生产、生活各个方面的形态、样式、习俗、制度以及智慧、经验等诸多信息，可以把它当作记录先民生产、生活内容的历史文献来进行研究，从而观察、揭示和推论其中的社会文化蕴涵，探索并展示汉字构形理据与社会生活的双向发展关系与规律。有关《说文》文化研究的著述很多，笔者撰有《说文文字系与上古社会》（新世界出版社 2012）一书对《说文》生产生活部类的字作系统研究，较为细致，正是这类文化研究较为系统的尝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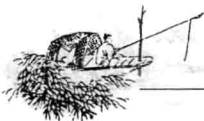
总之，许慎创通并建立的《说文》体例和系统，保存了古代的字形演变及所含的社会文化内容，运用“六书”分析造字本义，创立分部首按形义编排字书的体式等，一直为历代字书、韵书所承用，建树颇多，影响深远。段玉裁在为许慎《说文解字·叙》所作的注中盛赞许书的成就，谓“此前古未有之书，许君之所独创。若网在纲，如裘挈领，讨原以纳流，执要以说详。与《史籀篇》《仓颉篇》《凡将篇》乱杂无章之体例，不可以道里计”。

二、《说文》的流传及其版本

《说文》问世后，受到历代学者的重视，注释经典时常引证《说文》。如后汉郑玄、应劭等作注时引《说文》，六朝时《字林》《玉篇》《颜氏家训》等引用《说文》，隋唐时期的《经典释文》《一切经音义》《五经正义》等训释字义也大都依据《说文》。众多引用《说文》的文献中，《字林》《玉篇》引用最多，又以《原本玉篇残卷》各字下引《说文》最为严谨，可校正今传二徐本处甚多。其次以《经典释文》、李善《文选注》、孔颖达《五经正义》较有校勘价值。而玄应、慧琳《一切经音义》所引较为随意，常加删改，王国维谓其“不足信者甚多”。

关于《说文》的版本流传，周祖谟《问学集》（中华书局 1966）有《唐本说文与说文旧音》《说文解字之宋刻本》二文，所论颇详。王贵元《〈说文解字〉版本考述》（《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99 年第 6 期）有所补苴。现据以作简要介绍。

唐大历中（8 世纪中叶），李阳冰整理《说文》，修正笔法，重加刊定，



学者师之而广为传习。修正笔法，如“王：中画近上，王者则天之义；玉：三画正均，如贯玉也”。刊定形声，如“路，《说文》云：道也，从足各声。阳冰云：非各声，从足𠂔省”。另立新义，如“木，《说文》云：从中，下象其根。阳冰云：象木之形，取象于卉乎”。《崇文总目》载《李氏刊定说文》二十卷。而后蜀林罕《字原偏旁小说序》云：“至唐将作少监李阳冰就许氏《说文》复加刊正作三十卷，今之所行者是也。”然李氏书至宋代亡佚无存。尽管徐锴《说文解字系传·祛妄篇》列举李氏改许书 56 个字，五代及宋人多诋毁李阳冰“师心自用，颇有改易”，为许慎罪人，然实际上李阳冰所改并不多，存《说文》之功不可轻毁，因为如果没有李阳冰的整理刊行，《说文》就有可能与《字林》混为一谈而销声匿迹。

今天能见到《说文》最早的版本，为两种唐写本残卷。其一为唐穆宗元和间写本木部残卷，清同治二年（1863）莫友芝从黟县县令张仁发手中得到，仅存 6 纸 188 字。莫友芝以之与二徐本比较，撰写《唐写本〈说文〉笺异》一卷。莫氏去世后，木部残本转入端方之手，后流入日本，由内藤虎收藏。其二为口部残简两种，均为唐代日人摹本，一为日人平子尚所藏，仅存四字；一为日人某氏所藏，存六行 12 字。周祖谟《唐本说文与说文旧音》文中收有影印木部残本 6 页及口部残简 12 字摹本。经对比分析后周先生作出推论：此两种唐本《说文》非李阳冰刊定本，其训解胜于二徐之本，小徐本因袭唐本多，大徐本承袭李阳冰者多且改乱不少，故小徐本优于大徐本；唐以前人所引《说文》之音分两类，一类与《玉篇》音相合，另一类与《字林》音相近，木部、口部残卷之音可能取自《字林》，李阳冰本反切与木部、口部残卷同类，可见是大历间《说文》传本旧貌而非李氏所加音切。

五代南唐时，广陵（扬州）徐锴（字楚金，920—974）取《说文》原本加以注释，成《说文解字系传》四十卷，世称“小徐本”，重在注释，对《说文》原本极少校改，有疑议则在注释中说明。书中前三十卷为“通释”，随文疏释许慎说解，诠释名物，疏证古义。卷三十一至三十二为“部叙”，推论许书 540 部排列的理据；卷三十三至三十五为“通论”，阐发字形构造的含义；卷三十六“祛妄”，论李阳冰之误说；卷三十七“类聚”，论同类名物字的取象根据；卷三十八“错综”，多角度推阐古人造字的意旨；卷三十九“疑义”，论《说文》所缺字及字体与小篆不合者；卷四十“系述”，总述各篇著述的旨趣。全书征引丰富，释义精当，考查古书用字假借，最早指明字有引申义，还利用谐声偏旁探讨字源，内容十分丰富。其兄徐铉在《说文解字韵谱序》中评徐锴《说文解字系传》云：“考先贤之微言，畅许氏之玄旨，正阳冰之新义，折流俗之异端。”赞誉有加。徐锴后来又受徐铉之嘱，编纂《说文解字韵



谱》十卷，打乱原序而依《切韵》韵序编次，注语节引《说文》，以二三字为限，后徐铉依李舟《切韵》订正并补入新增文与新附字。

宋太宗雍熙三年(986)，徐锴之兄徐铉(字鼎臣，917—992)等奉敕校订《说文》，参考当时多种《说文》传世版本，取长补短，多所裁定，世称“大徐本”。徐铉校订本《说文》的增改主要有：补出《说文》释语有而字头未列之字19个，常见的有“笑、志、件、借、峰”等；补典籍承用、社会通用而《说文》未收之字于各部末为“新附”402字，用“臣铉等曰”标明增补释语及后出字体，间引李阳冰、徐锴注语，统一改用孙愐《唐韵》反切为各字注音，将《说文》正文十四卷、叙一卷各分上下成三十卷，将《说文》后叙中的卷次与部首目录复加于书首为“说文解字标目”。

南宋孝宗时，李焘、贾端修参照二徐《说文解字韵谱》，编成《说文解字五音韵谱》十二卷，依《集韵》列部次，同部字序依《类篇》排列，李焘、贾端书成之后徐铉又增入其新附字。从明万历二十六年(1598)陈大科刻本来看，正文前后附件虽有改动，但正文是照录《说文》单字解释，增漏甚少，基本保持大徐本原貌，且与藤花榭本多同。由于该书按韵编排而便利检索，元明两代广为流传，大徐本反倒少为人知。

明末清初，常熟毛晋(1599—1659)购得大徐本，嫌其字小，于顺治年间在其私人书楼“汲古阁”用大字开雕，未竟而毛晋卒，其子毛扆承父志于康熙四十年刻竣全书，是为“汲古阁本”。有康熙四十三、四十四年(1704—1705)毛扆手校样本，今藏南京图书馆。又有乾隆三十八年(1773)朱筠据汲古阁本重刻，今有日本静嘉堂藏本，“四部备要”本即据此本影印。又有光绪七年(1881)淮南书局覆刻本。惜毛氏汲古阁本屡据小徐本剗改，讹误较多，清人斥之为“识见弩下”，不以为善本。

清代依宋本刊刻的大徐本还有三种。其一为“平津馆本”，清嘉庆九年(1804)孙星衍校订刊行大徐本《说文》，收入其所集“平津馆丛书”中，故名“平津馆本”。此本存宋本原样，讹误较少，世称精善。此后刊印《说文》者多据此本。如同治十二年(1873)陈昌治据孙氏校订本改刻为一篆一行本，同年粤东书局据刻古经解汇函本，次年有东吴浦氏重印本，光绪元年(1875)有平江洪氏刻本，光绪十一年(1885)有上海同文书局石印本、吴县朱记荣影印平津馆丛书本等。其二为“藤花榭本”，嘉庆十二年(1807)额勒布据鲍惜分家藏宋本刊刻，扉页题“仿北宋小字本说文解字”、“嘉庆丁卯年开雕”、“藤花榭藏本”字样。此本讹误也较少，可与平津馆本比肩，但经与平津馆本比对，所据似非同一宋本。民国间，上海商务印书馆摹印过藤花榭本。其三为“丁少山覆刻宋监本”，光绪七年(1881)许瀚弟子丁少山校订重



刊汲古阁旧藏宋监本，扉页题“仿宋监本说文解字”，周祖谟撰《跋丁少山覆刻宋监本说文解字》（《周祖谟语言文史论集》，学苑出版社 2004）一文，介绍丁刻本的特点，其中有称丁氏校改精审者十多处。

清人校刻本多源于宋本，而今见宋刻递修本主要有三种。其一为青浦王昶所藏宋小字本，段玉裁撰《汲古阁说文订》时曾取此本参校。原本曾流入日本岩崎氏静嘉堂，民国间上海涵芬楼借出影印，收入“续古逸丛书”和“四部丛刊”中。此本有阮元收藏时的“阮元私印”与书末题字，谓“毛晋所刻即据此本”。其二是汪中所藏宋小字本，书末有丁晏道光十八年（1838）跋文。原本后归山东聊城杨氏海源阁，杨绍和题识谓“藤花榭所据之宋槧即此本也”，此本也有额勒布收藏的印迹，但经研究者比对，藤花榭本所据宋刻底本并非此本。其三为黄志淳藏本，该宋本缺标目，内有多枚“黄氏志淳”篆文朱文方印。研究者据字迹、避讳、刊工资料等考究，今传三种宋刊本并非同版之书，但源于同一原本或互有传承关系是可能的，三本的刊刻时间最早在南宋初年，并非北宋刊本。

现今最通行的《说文》大徐本，为中华书局 1963 年以陈昌治一篆一行本为底本的整理影印本，各小篆字首加楷体，书末附检字表。《说文解字系传》，最好的版本为道光十九年（1839）祁雋藻刻本，以顾千里所藏影抄宋本为底本，综合汪士钟所藏宋刻残卷，经承培元等仔细校订而成。中华书局 1987 年据祁刻本影印，为今通行的小徐本。

三、《说文》学的发展进程

《说文》成书之后，因其系统、精审而实用，受到历代学者的重视，为之作多方面研究的成果层出不穷。阳海清等编《文字音韵训诂知见书目》（湖北人民出版社 2002），收录今藏于各类图书馆的 1911 年前的小学著作书目，分文字、音韵、训诂、音义四大类，共 4813 种 12067 部，文字大类下专设“说文解字”类，收《说文》类古书目 1489 部（种），占全书总数的 12% 强，可见《说文》学著作数量之巨。

东汉时，《说文》成书不久，与许慎同时的郑玄注《仪礼》《周礼》就引用《说文》来训释经义了，稍后应劭等注《汉书》也援引《说文》说解以证字义。

魏晋南北朝时期，晋代晋灼注《汉书》引《说文》，北齐颜之推《颜氏家训》论及《说文》，南朝梁庾信著《广说文》一卷，《隋书·经籍志》载《说文音隐》四卷，贾思勰撰《齐民要术》、郦道元撰《水经注》引《说文》等。而该时期的《字林》《玉篇》与《说文》的关系尤为密切。《字林》，晋吕忱著，为补《说文》漏略而作。唐封演《封氏闻见记》谓“晋有吕忱，更按群典，搜求异